

以文字抵御时间

——关于江飞及其散文

罗 丽

我认识两位“江飞”。

“桐城江飞”是一位沉稳踏实的青年学者。历史上的“桐城派”，讲究“义法”，主张“义理、考据、辞章”三者并重，其文统源远流长，文论博大精深，著述丰厚清正，是我国清代文坛上最大的散文流派。祖籍桐城的江飞，治学著述，笔耕不辍，始终围绕文艺学、美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，出版了《新时期中国美学的存在论转向与理论形态建构》《文学性：雅各布森语言诗学研究》《朱光潜性全人教育思想》《理想与诗意——江飞文学评论集》等。这样的他，既有评论家敢于质疑和批判的勇气和锐气，也有着长年讲台执教的大气稳重和不苟言笑，以致他的某些学生戏说“江老师眉间承载着中华五千年的苦难”，甚至是“千金难买江飞笑”。

“作家江飞”是一位十年前便出版了散文集《纸上还乡》《何处还乡》的青年散文家。是的，他人生的原点和书写的笔墨都离不开一个名叫“罗岭”的村庄。罗岭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皖南小村，黄梅戏表演艺术家严凤英的家乡，虽然近些年也是乡村文化旅游的热门打卡点，然而，日常之中的罗岭始终是偏安一隅、与世无争的乡村。正是这样的一个生命原点，给予童年及少年的江飞无尽的真实、真切与真诚，促使着青年江飞开始写作，把自己对故乡的情愫诉诸于笔下。如其所言，“不管承认与否，我注定始终无法摆脱乡村（尤其是故乡罗岭）的‘纠缠’。那逝去的或现在依然存在着的某些乡土气息，仍让我念念不忘。”（《纸上还乡·序》）罗岭是江飞个体生命的记忆原点，也是他散文书写的精神根据地。

作家江飞的敏感，与学者江飞的敏锐相比，多了一份诗意的柔软。《纸上还乡》中的“时光之光”，浸润着他关于故乡罗岭的细碎记忆：孩童游戏时，听从哥哥安排藏身于厨房横板下，惨被滚烫开水揭去后背一层皮肉的难熬盛夏；1986年秋季入学时，身为民办教师的父亲如何将5岁的他丢给了教授一年级课程的二舅妈，从而开启了“早慧”的求学之途；某年寒冬腊月，母亲未讨得整年的工资而激动黯淡，外婆用省吃俭用的体己补贴了母亲，一家人方才勉强度过那个辛酸异常的春节。柔软而温暖，细密而真挚，这样的罗岭，这样的文字，像极了作家江飞本人，展现着丰沛又简约、内敛又昂扬的丰富立体。以至江飞并没有对当年的贫苦生出怨怼，他说：“我反倒感谢那时小学闭塞的庇护，是它让我们拥有了一个贫穷却完整的家，让我们的童年温暖、生动而没有遭遇爱的缺失。”（《渐晚东风又经年》）作为写作者，那些精微的、地方性的、小视角的、生机勃勃的经验和记忆，是江飞笔下最动人之处，他借由写作朝自己在时空上日渐远离、心灵上却不断重返的精神根据地一次次扎根。

作家梁实秋在《论散文》里说：“有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。”散文，表达的正是作家这个人。在江飞笔下，有着求真的庄重、求善的通透和求美的自在，浑然一体。私以为，散文并不是一种单凭技巧就可以取胜的文体，而是一



《何处还乡》
江 飞 著
清华大学出版社

种最本色的文体，容不得作假，“真情实感”一直是散文写作的重要准则。江飞的文字固然细腻柔美，诗意又温润，但真诚质朴才是其底色与本色所在。这样的一种本色，与我和作家江飞的交往感受相重合。评论家谢有顺认为，散文的背后站着一个人。日常待人真诚真挚的江飞，正是如此坚实地站在这些文字背后。因为“罗岭”，他有了最脚踏实地的向下书写；也因为罗岭的亲人和青春记忆，他有了最深沉关切的向内书写：这使得其写作在充斥着无病呻吟的散文书写中尤为可贵。

《纸上还乡》《何处还乡》里没有凌空蹈虚的东西，那些细节、那些故乡的人和事，都来自作家江飞自身幽微的经验，以及故乡在时代里生存的艰难痕迹。除了故乡罗岭，父母亲人绝对是江飞最重要的书写对象。

“村庄注定是属于父亲一个人的。他虔诚地守候在那里，像个称职的稻草人，守护着清香四溢的田野。而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外地，工作或者学习；他的妻子也在异乡，为支撑这个家而辛勤打工。一家四口，竟分作四处。”（《父亲的村庄》）尽管他说，“我的父亲，他把一生的笔触都锁定在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乡村，是他指引我走上创作之路，给我鼓励和安慰。”但仔细读来，会发现《鱼，飘在空中》《梦见母亲骑着鱼》《看见母亲，叫她回家》等许多篇幅，江飞都把目光投向了母亲。母亲一直把“家”背在身上，像一只笨拙而坚忍的蜗牛，那硬壳里住着愈来愈重的我们。母亲操持家务、母亲沿街卖鱼、母亲北京打工，在作家江飞心中，母亲等同于家，也等同于故乡。最终是母亲的去世，割裂了他与罗岭最直接的牵绊。

在这样一个日新月异高速飞驰的时代，江飞的写作更像是一种精神守护，退守到自己的根据地里，从感受、经验、记忆出发，然后扎根。罗岭、故园、亲人，正是江飞文学的出生地，是他的精神来源，他试图通过一次次地重申来让灵魂扎根、情感皈依，来抵御城市的浮

躁与悬空，这是江飞散文书写的精神实质。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，一个正被快速抛弃，一个正缓慢进入。”（《早班车》）江飞目睹了罗岭的渐行渐远，目睹了罗岭的面目模糊，因此有了《纸上还乡》《何处还乡》中的“世界两侧”。他笔下的罗岭，更多萦绕着早年的贫苦生活记忆，这些年来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，这些过往的记忆似乎也在日渐远离。这些年，他来到宜城立业安家，北上求学，合肥、北京、上海，不同城市的感官刺激充斥着过去的纯良简朴。“人们称那些在外流浪的或居无定所的人的生活方式叫‘漂’。”“漂，这个字眼多么生动，却又多么无奈，让我总不由得想到浮萍。”（《隐形的城市》）地理上原乡的消逝，使得他转而寻求自身的精神原乡。心安处是吾乡。可于他而言，精神原乡始终影影绰绰，难辨踪迹。“似乎一切都早已注定，于我，或在更多人的生命里，有两个夜晚：一个在城里，一个在乡下，都悬挂在我们窗外的树上。”（《两个夜晚》）江飞寄心于故土时，他经验的烙印、感受的方式、精神的底色才更为强烈和明晰。于是在《何处还乡》中，收入故园的文章篇幅竟然大大多于收入归途的部分。“是否有一天，我也会走出她以及村庄的视线，像一尾柔软的鱼，从她的竹篮里获得新生，或在寻找新生的途中悄然死去。”（《鱼飘在空中》）

散文重在表现自我，江飞描绘他眼中的故园和都市，解释他所理解的人情和世故，追问他所困惑的思绪和情愫，一如他每日傍晚在菱湖公园的散步与沉思。“成长是一个漫长且需耐心等待的过程，譬如一个人的成熟，一个城市的日益繁荣，都是如此，而行走却是唯一的姿势。”（《有根的城市》）我认识的“两个”江飞，无论是学者的他，还是作家的他，都是坚韧的，不会在时岁更迭和境遇变幻中束手就擒。博尔赫斯说“记忆建立时间”；江飞说“文字建立记忆”。是的，他终将在生活中老去，却能凭借文字在时间中获得记忆，最终为“生命的在场”立字为据。时间不会饶过我们，我们也不会饶过时间。学者江飞之所以写作，是只因他有着安庆师范大学的教授一职，但作家江飞之所以写作，是因为这个世界需要一个“我”，也需要“我”的语言。正如他说的“在被时光切割的生活片段里，我只能写诗，或者读诗。”（《沉重的肉身》）他以文字建立自身生命历程的纵横坐标，为自己的幸与不幸、爱与哀叹作注留影，抵御时间的流逝与侵扰。“‘我’首先是一个有生命的东西，一个在生存的东西，其次才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，‘我在故我思’，当我沉默的时候，身体即是我的语言以及我存在的意义，参与自我历史与我所在的历史的构建。”（《沉重的肉身》）江飞从个人的感受出发，接通了一个更为广大的人心世界，从窄小的情感私域走进了公共空间。江飞的散文名篇《沉重的肉身》，正是从个人感官、个体感受出发进行心灵探索和内心历练，以完成“我”在人间的写作，让灵魂接通感官，让思考思想介入世俗生活。

这些年来，作家江飞一直心心念念着“还乡三部曲”的写作，甚至第三部散文集的书名都早已想好——《无处还乡》。或许是学者江飞近年来在学术上用功颇深，无暇兼顾；又或许是已经成名的江飞不愿意重复自己，在对突破的期待中始终观望、踌躇。作为读者，我期待着作家江飞的新作早日诞生。

罗丽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、广东省评论家协会副主席、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。

